

公众的信任和公共利益

Patti McGill Peterson

美国教育委员会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前全球倡议项目总顾问、国际学者交流委员会前主席、韦尔斯学院 (the Wells College) 与圣劳伦斯大学 (the St. Lawrence University) 名誉校长

美国的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公众信任丧失的危险。这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大力支持高等教育是证明一个公民社会良好运转的重要特征。与新闻自由和独立法庭一样，大学和学院是民主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公众的看法，也就是它们同其他社会机构一起对公共利益作出贡献。

普遍的民意调查证实了支持率的下降。盖洛普 (Gallup) 的一项调查显示，从 2015 年到 2018 年，公众对高校的信心下降了近 10%。许多美国人仍然渴望接受高等教育，但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普及性和结果感到担忧，这也使得他们的信心受到了侵蚀。高等教育的成本及人们所认为的高等教育价值是他们失去信任的核心因素。学费和学生贷款的结合已经考验了学生和他们家庭对高等教育的信念。最终，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这样做值得吗？”

成本、价值和问责

价格的价值问题在美国的问责制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加强问责制也被认为是恢复公众信任的一种方式。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只有 48% 的成年人对高等教育有信心，而 76% 的人认为要求学校报告毕业率会有所帮助。无论是在机构一级，通过向申请人提供更多信息，还是通过政府使用“大学记分卡”之类的手段，目的都是让高等教育更有

利于客户，更值得信赖。

新的问责机制将依据学术项目和毕业生的短期收入来重点关注学生债务。这些分析旨在提高透明度和公众信心。其结果不仅是对高等教育预期结果的狭义看法，而且表明高等教育与公众的契约越来越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高等教育是一种基于个人投资回报的私人产品。

快速增长的学费和债务必须得到解决，但可持续的社会信任将需要与个人利益之外的更多东西联系起来。这将是一个挑战。哥伦比亚大学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师范学院的一项调查提供了发人深省的见解，它表明了美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政治格局如何使公众信任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联系变得复杂化的。

弥合分歧

政治分歧并没有使公众信任受益。保守派批评人士在言论自由、有政治偏见的教员和政治正确的课程等问题上攻击学院和大学。他们给高等教育贴上“精英俱乐部”的标签，说它与普通公民脱节。数据证实了深刻的政治分歧，但基于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也存在同样深刻的分歧。在有关高等教育对造福社会、国家繁荣和发展的科学进步的贡献，以及毕业生的个人充实和成长等问题上，大学毕业生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之间存在着

巨大的差距。后者对高等教育的好处持更负面的看法。

高等教育的关系基于那些直接参与提供或接受高等教育利益的人。对于传统的实体机构来说，这些关系建立在通常对公众来说很神秘的机构文化之上。外人很难理解在这种文化里表现出的许多做法和语言。鉴于最近发生的丑闻，一些重点院校的招生和经济援助做法需要更多的解释。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高等教育的专家们经常用专业术语说话，诸如机构自治、同行评议、学术自由、国际化和文科等术语往往会放大这种神秘感。

建立信任

信任是建立在对高等教育对公共利益贡献的评价之上的，它始于这样一种认识，即高等教育机构做什么，为什么要做，需要更清晰的解释，需要更好地与公众沟通。这始于学院和大学所在的社区，但它不仅需要建立本地关系，还需要进行全国对话。

对高等教育的一些批评是理所当然的，应该作为与公众讨论的一部分。现在是时候进行更有说服力的对话了。研究气候的科学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用非学术界人士能够理解的方式撰写和谈论一个紧迫而复杂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吸引广泛的受众对于创建与否定支持者相对立的对话非常重要。高等教育有很多内容需要与公众讨论。

这种参与的要素将建立在强有力的、透明的制度关系的基础上，这种关系最终将在国家层面形成一种协调的、集体的声音，这不仅为个人、而且还能为公共利益带来价值。

全球性的影响

美国有它自己的挑战，但它并不是唯一面临高等教育价值和公众信心丧失问题的国家。在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社会契约正在瓦解。那些曾经大力补贴高等教育的学校，已经变成增加与学生分担成本的学校，从而进入了商品化和物有所值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结果、透明度和道德实践变成了重要且合理的期望，但它们不足以成为高等教育与公共利益有无数联系的强烈理由。虽然各地的教育机构都有义务对每个学生负责，但它不能取代一个更全面的描述，也就是讲述教育机构的基本使命，即研究、教学和服务，以及如何以积极的方式对整个社会作出贡献。

将高等教育描述为精英主义、无关紧要或对公众构成威胁的主流国家型论调，需要强有力的回应。面对对民主制度的攻击、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反全球主义，这种反叙述可能意味着大学要比传统上更多地与公众接触。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是积极主动地将其工作与公共利益联系起来，以保持公众的信任。